

古代诗文曲研究论集

孙立涛 主编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团队“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创新团队”成果

古代诗文曲研究论集

孙立涛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诗文曲研究论集 / 孙立涛主编.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3. 8

ISBN 978-7-5670-3561-4

I. ①古… II. ①孙…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文集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③古代戏曲—中国—文集 IV. ① I206.2-53 ② J809-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28880 号

古代诗文曲研究论集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Ancient Poetry, Literature and Verse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刘文菁	
网 址	http://pub.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付绍瑜	电 话 0532-85902533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9.75	
字 数	158 千	
印 数	1—1 000	
定 价	5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18663037500,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编委会



主编 孙立涛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今晖 刘 畅

杨宝春 周 潇

焦绪霞

目 录



《诗经》季节表现研究述论 / 孙立涛 郭 玲·····	001
早期比翼鸟意象及其流变 / 周 梅·····	015
简而当理 灵而出新——李德裕文章理论刍议 / 李若君·····	032
宋代花馔诗探微——以苏轼、杨万里为例 / 耿 娜·····	046
李昌龄《太上感应篇传》相关问题探讨 / 焦绪霞·····	077
《白兔记》俗性特征分析 / 杨宝春·····	091
道教斋醮仪式中的戏剧表演意蕴 / 黄 静·····	103
明初馆阁作家许彬存世诗文辑考 / 岳秀芝·····	115
桐城三祖与文人私传 / 刘 畅·····	125
张问陶川蜀纪行诗的书写及性灵派特征 / 龚 雪 周 潇·····	134
后 记·····	147

《诗经》季节表现研究述论

孙立涛 郭 玲

摘 要:《诗经》内含明确的时间观念,表达时间或时序的方式多种多样,学者对其时间表现方法、时间时序意识和时间用语等多有关注和研究。《诗经》中各种动植物名物往往是季节性的反映,学者在谈及《诗经》“比兴”时也往往会述及此。《诗经》含有丰富的时令性词汇以及与之对应的民事活动,从中还可体察季节时令与周代婚嫁、祭祀、农事等社会风俗的关系。《诗经》内容情感的抒发也与季节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春季和秋季。《诗经》作为季节表现的发端,又对汉魏六朝文人诗歌情景关系的营造起到了助燃的作用。因此,《诗经》季节表现及其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挖。

关键词:《诗经》;季节表现;时间时序;民俗;情感

《诗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传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不仅体现了《诗经》内容的广博性,而且表明《诗经》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阮元(1980)《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载《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揭示出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特质,《诗经》的抒情方式多是喻志于物或触物兴词。在《诗经》时代,与生活关联的万事万物都有可能



触发作者的情思并进而发言为诗,而古代诗人较为敏感的季节变化,自然也是《诗经》抒发情感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在《诗经》季节表现方面展开研究,笔者在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受益良多,故将相关研究成果列于下文,以飨广大读者,同时附程臆见,以求教于方家。



《诗经》中时间与时序

《诗经》中的作品虽然有着明确的时间观念,但表达时间或时序的方式却多种多样,所以对时间呈现和时序意识进行研究,是认识《诗经》季节表现的重要途径。

关于《诗经》中时间的表现方法,当代学者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姜志军等(2008)指出,《诗经》的时间诗语内涵简单而明确,多以典型意象的生长过程或者生命周期来作为时间表现的一种手段。郭宝玉(2009)将《诗经》中记述时间的方式分为六种,即天体运行、风霜雨雪、动物活动与植物兴衰、人群活动、社会习俗以及直接点名年月,还考察了《诗经》中的时间因素具有的文学意义,指出某些时代信息也可以从《诗经》中的时间表达及观念中表现出来,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时间因素与农事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庆洲(2010)从文字训诂入手,将《诗经》中的时间概念分为显性时间和隐性时间,前者是以日、月、年等历法时间表示,后者是以星象、物候以及空间转换来表示。董涓涓(2019)把《诗经》中描写时间推移的类型分为四类,分别是直接叙写、借物候变化叙写、借自然现象叙写、借事情发展叙写,同时指出,这些表现时间推移的描写主要体现在《诗经·国风》之中,其中借助物候、自然现象等来表现时间,也使得诗歌结构更加紧密严整,形成含蓄蕴藉的风格特征。吴婕(2012)指出,《诗经》通过时间名词和副词、自然物候、生产活动、社会习俗来表现时间意识,并对这四种表现时间的方式进行了举例论证,同时指出这些时间意识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诗经》中的时间时序意识,今人也有着较为充分的研究,研究的方式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张蕾(2005)将先民的时间意识



分为时序感受、心理感受、生命感受三个方面,并根据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理论分析了《诗经》中的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从而将《诗经》表现出的时间意识与人物心理感受相联系。张新(2007)和陈玲(2009)主要以西方的时间观念为依据来探讨中国先民的时间意识。前者讨论了《诗经》中的时间再现问题,分析了《诗经》时代的时间观念,即循环时观和阴阳时观,介绍了《诗经》时代的时间观念对时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并因此造就出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后者根据胡塞尔的理论并联系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从时间的自然对象化、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循环性及时间的及时性四个方面,来探讨周代先民的时间意识,从而揭示了周代先民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中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陈向春(2008)在谈及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主题时认为,《诗经》中的时间主题,是存在于物理学层面的主题,还并未过渡到哲学层面的时间,所以并不具备后世诗歌中的情感蕴藉和生命体验。许迪(2014)将《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延伸到权命、时运、先王三个方面,从生命观和历史观的角度去阐发《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并与宗教和哲学相联系。这种跨学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诗经》时间意识研究的范围。隋宇(2015)与以上偏重于时间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重点分析了《诗经》中的时序变化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同时指出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固定的劳动、祈祷、恋爱成婚等活动是《诗经》时序意识源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把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作为《诗经》时间观念的重要表现方式。

此外,今人还对《诗经》的时间用语进行了相应的考释,考释主要集中在《诗经》中时间副词的使用上。张道俊(2006)归纳出《诗经》中22个时间副词,并对这些时间副词做了整理分析,认为《诗经》中已经形成了包括时间、范围、程度、情态、语气等在内的完整副词系统。余艳(2008)在统计《诗经》时间范畴表达的基础上,联系胡明杨的语义语法范畴中的显性时间语法和隐性时间语法的理论,分析了《诗经》中的时间短语以及时间副词,还总结出用于记日、记月、记季节、记年岁的时间单位,这些时间单位也多以字、词、句的形式出现。王金芳(2011)指出,时间副词在《诗经》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并且用法多样,可分为表初始、表过去、表正在、表将来、表暂且、表终究等六大类,包括“初”“始”“载”“肇”等在内的25个常用时间副词,在风、雅、颂中均有出现。这说明《诗经》的时间要素主要通过时间副词的运用表现出来,同时也说明《诗经》时代



时间意识已经形成,并开始追求语言表达的精细化。另外,刘姝辰(2012)将《诗经》中的时间副词分为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将要发生、表时间先后、表永久长期、表暂时、表不定时等七种类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诗经》中的时间概念已经相对成熟。

由上可见,当今学者在《诗经》的时间表现方法、时间时序意识和时间用语等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有的从诗歌语言本身入手做出详细考证,有的将其与先民心理、社会民俗相关联,或将其与诗歌风格及文学影响相结合,其间综合运用到文本考据、文字训诂、语言学、国外相关理论等研究方法,这些成果无疑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诗经》中的季节表现有一定的帮助。



《诗经》中的季节姓名物

自古至今,《诗经》中的名物备受关注,关于《诗经》名物考据的文献资料也有很多。孔子(1980)曾指出,学习《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代《毛诗故训传》中已出现对各种名物名称的注解。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是第一部研讨《诗经》名物的专著,对《诗经》中的很多名物进行了认识和辨别。之后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宋代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清代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民国童士恺的《毛诗植物名考》等著述,也在《诗经》名物考据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总体来看,这些名物考据力求全面,并非专门针对季节姓名物进行的专门研究,不过其中涉及的一些动植物的考据,也为《诗经》的季节表现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王建堂(1995)指出,《诗经》中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鸟是重要的参照物,各种鸟类的活动具有标明物候的作用,扬之水(2000)也说道:“《诗》以物纪时,所谓‘以草木为春秋’也。”一语中的地点明了《诗经》中各种动植物名物与季节因素的关联。

刘赫秀(2012)在《诗经》季节姓名物研究方面用力颇深,将《诗经》中的物候按照四季冷暖划分为春季物候、夏季物候、秋季物候、冬季物候四类,并整理出四季各具代表性的季节物候:春季有植物抽芽和开花、鸪鹑等鸟类鸣叫等标志性物候现象;夏季有打雷、蝉鸣、植物繁茂、荷花盛开等标志性物候现象;秋



季有虫鸣、草木凋敝、大雁等标志性物候现象；冬季有北风、雨雪、寒冰、棠梨树等标志性物候现象。另外，该文在述及“物候描写的功能”时指出，《诗经》通过四季的各种物候现象来传递情感、渲染情境，具有立体的感觉效果，也就是说，《诗经》中某些季节表现与诗情、诗境的营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庆洲(2010)将《诗经》中的时间概念分为显性时间和隐性时间两大类，其中隐性时间与星象的转换、候鸟的来去、植物的萌生凋零等物候现象息息相关，并指出斯螽、莎鸡、蟋蟀等虫的活动变化也预示着时间的更替。

另外，学者在谈及《诗经》中的“比兴”时，也往往会述及季节性名物。在《毛诗故训传》中标示起兴的诗句有百余句，其中绝大多数以草木虫鱼这类季节性名物起兴。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言：“诗尚比兴，必旁通鸟兽草木之名。”这表明，《诗经》中的比兴与草木鸟兽这种能够反映季节时令的名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人在“比兴”与季节性名物的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比如夏传才(1985)在论述《诗经》“兴的艺术”时提及，借物、借景起兴的诗句中存在大量季节性风物，这一方面能够点名时令，另一方面与诗人情感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吕华亮(2008)也指出，《诗经》的比兴以草木鸟兽鱼虫作为载体，而通过对草木鸟兽虫鱼的描写也恰恰反映出其季节性，因而众多名物的运用便成为季节性描写。



《诗经》中的季节与民俗

班固(2007)在《汉书·地理志》中谈及“风俗”时曰：“凡民函五常六性，而其刚柔缓急，音色不同，系水土之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这里将“风”和“俗”分别进行了解释，认为“风”是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俗”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环境。与之相似，应劭(1990)在《风俗通义》序言中也说：“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圣人作而均齐之。”“天气有寒煖”的“风”恰恰反映了季节上的更替变化，其与“俗”密切相关。所以，姚际恒(1958)在《诗经通论》中说道：“鸟语



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绌升屋,似风俗书……”这说明,《诗经》是周代文化风貌的真实反映,其中含有丰富的时令性词汇以及与之对应的民事活动,从中可体察季节时令与周代社会风俗间的紧密关系。

关于《诗经》中季节与民俗的关系,当今学者在某些领域也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比如《诗经》婚嫁风俗的季节表现,在当今学者间即有着较为充分的探讨。举例来看,毛忠贤(1988)指出《诗经》中的婚恋诗多以春季为背景,但并未展开论述。后来郇林涛(1997)着重阐释了《诗经》婚嫁诗所反映的女祭、婚时、聘礼等习俗,分析了其深层内涵与文化心理,并对婚嫁时令进行了详细考述,他将春季嫁娶与阴阳之气相联系,认为春娶有利于子嗣繁育。而何保英(2001)明确地把春季与男女约会、恋爱主题相关联,通过蔓草、彤管、木瓜等具有明显节令性的赠物来考述这一问题,同时还将《诗经》中大量的爱情婚恋诗与古代的六礼做出了对应。王佳楠(2001)在分析《诗经》中大量爱情诗的基础上,对当时的婚俗与民俗进行考释,并通过对《诗经》中季节描写的分析,得出“婚嫁之事始秋末,迄于春初”的结论。涂庆红(2002)在谈及婚恋风俗问题时,对《国风》中许多诗篇的景物描写进行了分析,认为仲春时节是男女进行自由恋爱交往的时节,同时仲春、秋冬时节皆有对婚嫁之事的描述,但受农耕经济的影响,周人将婚姻之事一般放在秋冬农闲时节。法国学者葛言兰(2005)谈及《诗经》中的情歌时,初步将婚恋之事与季节相关联;葛言兰等人(2020)认为春季并不是时人举行婚礼的时节,而是缔结婚约的时节。

除了《诗经》婚嫁风俗与季节的关系外,当今学者对《诗经》中祭祀、农事活动的季节表现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刘源(2004)《商周祭祖礼研究》、钱杭(1991)《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赵沛霖(1989)《诗经研究反思》等学者在其著作中,都论及《诗经》的祭祀诗。但多数学者认为,《诗经》祭祀诗篇在思想意义、艺术表现等方面的价值有所欠缺,祭祀研究也多集中在题旨、制度、政治、祭祀对象等方面。近年来,也有部分论著从时令角度对《诗经》祭祀、农事活动进行探讨。江林(2004)指出,周代的祭祀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如社稷、四方、大雩、籍田、大腊、田祖、先蚕、时享、荐新等祭祀典礼。葛言兰(2005)对《诗经》中涉及的季节感、节气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诗经》时代的节庆与太阳周期、植物生长周期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是依赖于农民的生活节律,也就是说,《诗经》中所体现出的季节感与农



事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冯红等人(2006)也认为,在《诗经》时代,农事为立国之本,祭祀为治国之政,二者密不可分,同时以一系列具体诗歌为例,详细考证了春季籍田礼和秋季尝礼的祭祀过程及其与农事的关系。吴丽清(2006)对于春天的籍田礼进行了详细的考述,指出农事与祭祀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农业方面对社稷的祭祀主要有仲春祈谷、仲秋报谢、孟冬大祭。杨颖(2011)在谈及祭祖诗中的献祭品时指出,周代四季有不同的祭祀习俗,即春祠正月始食韭,夏禴四月食麦,秋尝七月尝黍稷,冬烝十月进初稻,并以《豳风·七月》《小雅·信南山》等为例说明,在不同时节以不同祭品进行祭祀,这是由所收获的农作物来决定的。张珂(2011)以《豳风·七月》季节月令为线索,考述了不同季节下豳地的风俗风貌,如天文历法、农事、保鲜、物候、祭祀、纺织,也就是说,季节历法对于农业生产领域风俗与民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上可见,学者们在探讨《诗经》中的季节与民俗的关系时,多集中在婚嫁风俗中的季节表现、祭祀与农事中的季节表现两个方面。其实,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卜筮活动、节庆习俗、社会组织,乃至游牧狩猎、手工劳动、服饰装扮,均在《诗经》季节表现中有着一定的反映,这些也值得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诗经》中的季节与情感

《诗经》内容情感的抒发也与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季节表现一般集中在春季和秋季上。日本学者松浦久友等人(1982)述及季节意识与时间意识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诗歌更侧重于表现春秋季节的原因在于时间意识,春秋由于其推移属性相比于夏冬更能体现时间意识,因而能够成为诗歌中优先表现的季节。当然,在中国古代诗歌之中,时间意识与诗人情感间也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

首先,来看春季。洪之渊(2008)指出,《诗经》中表达婚恋之情的兴语,往往与春季各种动植物的物候现象相关联。田利红(2010)以《国风》中的诗篇为例对春季表现进行了概括总结,从中可以看出,“春天”在《诗经》中有着多样



的表现方式,主要通过自然界的气候现象以及动植物的各种情态来表现;“春天”与《诗经》起兴之间的关系密切,且此类兴句数量众多,能起到奠定全诗情感氛围的作用;而且《诗经》中与春天有关的活动也有很多,男女婚期、婚恋之事是最主要的体现。庄瑞彬(2012)认为,《诗经》中的春天景物大都洋溢着欣欣向荣、快活、成长的气氛,体现了时人对春天的生命礼赞及感动之情。与之相似,张诏宣(2021)认为《诗经》中的春季物候意象总是明媚阳光、喜庆欢乐的,且多与婚恋诗联系紧密,即便是出现在战争徭役诗中的春季物候意象,也很少有对执政者不满的表现。由此可见,《诗经》中的春季表现总是积极的、温情的。

其次,来看秋季。朱芳(2008)将英国济慈的《秋颂》与《诗经·良耜》进行了对比研究,她认为英国诗人在诗歌中喜好表现夏冬,而中国早期诗歌则喜好表现春秋,同时还指出《诗经》中的秋季表现,除了悲秋感伤基调之外,还有丰收主题和神话质素这两大重要表现,从而打破了人们对于《诗经》乃至中国早期诗歌悲秋情感的单一认知。另外,庄瑞彬(2012)在述及“诗歌中的秋”主题时也认为,《诗经》中的诗篇已经揭开了中国文学中悲秋主题的序幕。与之相似,王蕊(2013)指出,《诗经》的诗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秋季景物进行起兴的抒情方式,且多为“悲哉秋多为气也”的悲秋、伤感基调。

以上研究表明,《诗经》中的某些主题情感已经与季节,尤其是春秋季发生了联系,而且《诗经》中的季节表现是后世诗歌季节表现的滥觞。



后世诗歌季节表现对《诗经》的继承

《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也包括后世诗歌在季节表现方面对《诗经》的继承发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楚辞》中的季节表现对于《诗经》的继承发展。《楚辞》中含有大量的季节性用语,例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



芳”（《九章·惜诵》）；“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九章·涉江》）；“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九章·抽思》）；“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九章·怀沙》）；“何芳草之早凋兮，微霜降而下戒”（《九章·惜往日》）；“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九章·悲回风》）；“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天问》）；“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九辩》）。朱熹（1953）在解释“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这一诗句时云：“目极千里，言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见千里，令人愁思也。”这表明，春天这个在《诗经》中原本活力美好的季节，至战国时期的《楚辞》之中反而具有了一定的感伤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诗经》季节意识滥觞之后，《楚辞》中的季节表现与比兴手法一样，也开始具有了自觉的意识。今人施仲贞（2013）也指出，《楚辞》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现象的变化来昭示时间流逝的诗句，如秋季多以“草木零落”“百草不芳”等植物的凋落来表现，这种物象往往具有感伤意味，对于《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即仍“以物纪时”。

二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五言诗对于《诗经》季节表现的继承。研究者认为，《古诗十九首》表现出的强烈的时间观念与生命意识与《诗经》的季节表现具有一脉相承性。例如，傅锡洪（2011）述及时间意识及其呈现方式时认为，冬秋季节会引发诗人对于衰老的联想，季节的更替、朝露的易逝等都是引起诗人感发的因素，诗歌中所呈现的也都是真景物、真感情，这些极大地受到《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李阿芳（2012）指出，《古诗十九首》对于时间与生命意识的深刻体认与率真表达受到包括《诗经》在内的前代诗歌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是建安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前奏，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王倩（2013）指出，《古诗十九首》中季节性计时概念交替出现，伤时感蕴藏在时间的记录中；而《诗经》在时间概念的表达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时间的明确性也较强，为情感的传递铺平了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五言诗。

当然，在季节表现的承继之外，艺术成就甚高的《古诗十九首》在主题、意象、用典、情感等方面也与《诗经》之间存在诸多可比性，相关学者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三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对于《诗经》季节表现的继承，这主要表现在情景关系



的处理上。关于此,魏晋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有着深刻的认识。刘勰(1986)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谈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指季节的变化引起景物的变化,景物的变化又引起人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其后又以“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进行阐释,这进一步说明了人的情思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创作的灵感就是由这些景物的变化而激发的。而陆机(1982)《文赋》又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1998)《诗品》亦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同样是在说明,诗歌创作过程中四时物色的变化与情思、灵感之间的关系。另外,南朝梁代宋懔的《荆楚岁时记》、宋代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对岁时诗有专门的辑录。以上这些著作充分注意到了四季与诗歌情思之间的关联,而这一关联的根源自然可以上溯到《诗经》中的诗歌。

除了魏晋南朝时期的文人学者注意到季节景物与抒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外,今人对此方面也有相应的关注,基本认为《诗经》是诗歌季节表现的发端,对魏晋南北朝同类型的诗歌起到了奠基作用。如沈凡玉(2007)从文学史的角度描绘出魏晋至齐梁时期诗歌中季节书写的嬗变过程,并指出魏晋时期的诗人大多遵循着《诗经》与《楚辞》的季节书写传统。张晓青(2012)同样认为,最初诗人们较多地继承了先秦《诗经》时代的“比兴”传统与“感时物之变”的模式,季节在诗歌中往往是一种象征或比喻,特定季节总与特定抒情主题相连,但晋代以后,季节表现开始作为单纯的景物描写出现,得以承载更多样的诗情,成为诗歌抒情的背景与伴奏。另外,张晓青(2012)指出:“在中国诗歌之初,季节感就已经成为古典诗歌的感觉表达方式和结构形态的基本属性之一。”同时列举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对于《诗经》中季语典故的化用情况,这说明先秦诗歌中就已经出现魏晋南朝理论家笔下的季节情思,并且后世诗歌季节表现的发展离不开《诗经》所奠定的基础。而翁林颖(2019)专门追溯了《诗经》与《楚辞》的季节书写,并指出《诗经》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自然描写的先河,季节物色作为自然描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以比兴的方式零星地出现在《诗经》当中。也就是说,季节的物色并不是作者想要表现的中心对象,而是起到引子或者象征的作用,这也是季节参与诗歌抒写的萌芽。

经上可见,《诗经》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季节表现方面具有奠基作



用,魏晋南朝以来的“感物”诗学与《诗经》中季节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后代诗歌中的时序意识、“伤春悲秋”的季节偏好以及“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都由此滥觞。除了魏晋南朝的理论著作对诗歌中的季节表现予以阐发外,在后世,尤其是唐宋时期,一些大型类书中出现了以季节为分类标准来整理书目的方法,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皆有“岁时部”,在“岁时部”下再细分为春、夏、秋、冬四小部,其中涉及诗歌作品的部分相当于为其季节性表现做了梳理工作,这方便了后人的查找与参阅,同时也反映出历代文人学者的季节意识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诗经》存在较强的时间时序意识,除直接呈现外,多借他物他事表现;而季节作为时间时序意识中的重要方面,其表现形式亦有多多样化的特点,或是借动植物来表现,或以自然现象与农事生产来反映,或是直接点明;这些季节表现有些存在于兴句之中,不仅与诗情诗境发生关联,而且还能够从中体察世风民情。《诗经》季节表现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战国时期的《楚辞》作品,还是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抑或魏晋南朝时期大量的抒情诗,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或发展了《诗经》的季节表现;诗人往往将季节变化作为情感抒发的依托,从而对中国早期诗歌情景关系的营造起到一定的助燃作用,魏晋之后的文人理论著作中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宋及以后,一些文人集中也开始以“四时”为编目来收集各类作品,可见其影响之深。但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虽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究,但整体上看关注度并不理想,或研究不够细致深入,且个别领域多以硕博研究生论文为主,系统性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尚少。所以,《诗经》季节表现还有广阔的空间值得去挖掘,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亦望各位学人能在此领域继续开拓,进一步将研究引向深入。

| 参考文献 |

- [1]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陈玲. 从《诗经》看周代先民的时间意识特征 [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 [3] 陈向春. 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3-36.